



◎ 亲历者的记忆

历史转折

1977—1978

杨胜群 陈晋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亲历者的记忆

历史转折

1977—1978

杨胜群 陈 晋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转折：1977—1978/杨胜群，陈晋主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

(亲历者的记忆丛书)

ISBN 978-7-108-03308-6

I. 历… II. ①杨…②陈…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1977~1978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001号

责任编辑 朱竟梅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1/32 印张21.25

字 数 289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冲破“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怎么提出来的 ----- 3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 ----- 8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在三〇一医院住院的日子 ----- 17

老同志的呼声 ----- 21

复出过程 ----- 25

恢复高考

推翻“两个估计” ----- 35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 46

一代人的命运被改变 ----- 63

全国科学大会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 77

- 邓小平的著名讲话 84
 〔附〕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78年3月18日） 90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05
 大讨论的领导和推动者 119
 思想解放的潮流 132
 〔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142

走出国门再看世界

- 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 153
 邓小平访问日本和东南亚 168

国务院务虚会

- 改革开放的一次思想酝酿 183
 李先念、胡乔木的两篇重要讲话 190
 〔附〕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1978年9月9日） 198

邓小平东北之行

- “到处点火”倡导解放思想 211
 五次重要谈话 221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 拨乱反正的会议 233
 邓小平、陈云等主导会议 272

[附]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 ----- 292

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 305

全会文件的形成过程 ----- 317

[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1978年12月22日通过) ----- 323

后 记 ----- 334

冲破“两个凡是”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新中国的历史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阐发“抓纲治国”方针的同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一些理论工作者纷纷提出质疑和反对。邓小平率先倡导实事求是，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斗争逐步展开。

“两个凡是”是怎么提出来的

耿飏（时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

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

我接到这篇社论稿后，便和宣传口的领导成员一起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但是，听了李鑫同志传达汪东兴同志的指示后，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去发表。至于组织宣传“两个凡是”的工作，我们只是向各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转达了汪东兴的指示，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要求和部署，以后也未进行检查。[《耿飏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当时我在中央宣传口，耿飏同志是主要负责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出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而且，东兴同志还强调不能修改一字，这不符合民主精神，是硬加给我们的嘛！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很不满意。

但是，作为“两报一刊”中的一报《解放军报》的社长，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我们只好照登了。在议论的时候，耿飏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这样办，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我们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这番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访华楠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1期]

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转引自刘宋斌：《走向大转折的年代：1976—1978年的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于化民（学者）——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仰，

但也由此滋生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甚至是迷信。几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准则，当作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既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与这种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想继续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没有自己的理论，他们所坚持的，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问题是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表现出维护毛泽东的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理论上的争论，还得回归到理论上解决。[《“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

黄一兵（学者）——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早在1972年，中央在解决一个省级领导人问题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也讲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样的话。后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顺承了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的意见，于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了类似的话，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1977年1月下旬，一篇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为他起草的讲话稿中，也糅进了“两个凡是”的精神。这篇讲话稿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1976年以后的这种“凡是”精神，连同后来“两报一刊”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思想，虽然大多不是出自华国锋的手笔，但这种思想精神却都是华国锋首肯的，应该说，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大力推动和贯彻执行了这个思想。

“两个凡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第一，它延续了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多个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说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1月8日，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有个名叫邓可的青年，给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贴了两张大字报，提出批评意见。不久，这个青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直到8月15日才释放。随后，中共辽宁省旅大市委、旅大市革委会门前贴出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和“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等等。对此，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电话记录旁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随后，又批发了有关中共中央文件，指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或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些文件要求对证据确凿的谣言制造者坚决逮捕或镇压。在这些文件指导下，有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

第二，“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形成了迈向新时期的严重阻碍。由于具有浓厚“两个凡是”思想的领导人获得并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解释权，他们可以通过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和解释来推行“两个凡是”思想。一位中央领导曾在宣传部门一个会上讲：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凭借这一点取其所需，来为“两个凡是”的需要服务。如需要树立自己的形象时，就拿出“你办事，我放心”等；在选用干部问题上，就利用毛泽东说过这个人右倾，那个人不可重用之类的话来影响人事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时，也常常指明，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推翻，那篇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不能批等等，以贯彻“两个凡是”精神。

第三，“两个凡是”方针的实施，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得以延续，严重影响了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两个凡是”方针的

指导下，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大批被错斗、错关的干部群众不能及时获释；阶级斗争的藩篱难以跳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不能实现转移；知识分子依然为臭老九，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其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克服，“四人帮”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无法根本改变，社会主义走向新时期的步伐也无法迅速迈出。[《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

邓小平——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云——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由于“四人帮”的影响，今天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两个凡是”的思潮在军内也有一定的市场，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也费了一番工夫。就从1977年筹备和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说起。

“四人帮”被粉碎后，军队开始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但是小平同志、叶帅考虑，揭批林彪、“四人帮”，时间不能搞得过长。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也是如此。军队要把重点转移到教育训练上，这就需要定下相应的章程和方针来指导军队建设。军委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大概从1977年9月份开始，我们就着手筹备军委全会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叶帅的主题报告和其他几个条例、决定等。主题报告的起草由罗瑞卿同志具体主持，他是军委秘书长，还有梁必业和我以及其他五六个同志参加。当时主题报告的题目已经定下来了，叫做《抓纲治军，准备

打仗》。主题报告的题目，是梁必业和罗瑞卿同志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认可的。

1977年10月份，我们随小平同志的专列南下。一路上，小平同志分别找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政要员谈话，听取地方的汇报，我也参加了。在火车上，小平同志找我们谈主题报告《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时候，他说：这个文件以什么为纲？怎么叫个纲？揭批林彪、“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阶级斗争为纲怎么样？罗瑞卿同志很敏锐，他说：“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是个打人的棍子。”

看来，小平同志对“纲”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而罗瑞卿同志则把小平同志的思想挑明了。所以，我对这次谈话印象很深。

到了广州，大家又继续讨论。小平同志说，看起来，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罗瑞卿同志坚决赞成。在研究主题报告时，罗瑞卿同志又具体化了。他问我们：你们看怎么办啊？怎么解决？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怎么办？怎么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这是他晚年错误理论的基石，并作为当时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人们已经把这当做天经地义的事。如果猛然取消它，会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弄不好，还可能出乱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瑞卿同志请示叶帅和小平同志后，积极组织研究，翻阅好多书，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用毛主席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的精神，讲党的工作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把这两者区分开，用这个区分来冲淡以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怎么区分呢？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强调的是具体工作路线，军队的具体工作路线就是要整顿，要搞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要准备打仗，就当时全党全军的情况来说，一下子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很不容易，而用具体路线就可以避开“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很机智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对“两个凡是”要害问题的大胆批评。

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精心准备。用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当然可以把问题说得通，但为了做到立论更稳，说服力更强，我特地从广州打电话回北京，让解放军报社资料室的同志整理一份材料：《毛主席关于“纲”的论述》。后来又进一步补充整理成《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纲”及有关问题的论述（部分摘录）》。这些材料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文件上有关“纲”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提法有所改变。比如说在1958年，党中央就提出过“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196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工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也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提法。1965年《二十三条》又强调“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么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把这个材料向罗瑞卿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他请示叶帅和小平同志后又对我说：我们要把揭批林彪、“四人帮”当作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也可以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有人挑刺也挑不出来。并要求我们要继续研究用各种方法淡化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

我们在广州待了将近一个月。起草报告时也确实考虑过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党的领袖？应该把党的领袖放在一个怎样的合理位置？而科学地对待党的领袖，势必与神化个人、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发生严重冲突。所以，在起草报告的时候，我们根据叶帅、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意见，注意从恢复我们党的老传统出发，把党的领袖摆在科学的位置，没有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过分突出华国锋同志，在文件中提到他的次数也少。

当时，就这个问题，罗瑞卿同志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称呼次序多数只是提党中央，或者党中央、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提毛主席、党中央，后来仅提毛主席，这就不正常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的原理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列宁就讲过，群众里面分阶